

冲突与折衷：国民党五全大会延期召开原因探讨

陈红民 张 玲 郭昌文

[摘要] 1934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曾宣布将召开五全大会并筹备，但不久却又宣布因“剿共”军事延期召开。本文通过新的史料，细辨真伪，揭示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才是会议延期的真实原因，且由此分析蒋介石对待党内反对派手法的变化及国民党党内斗争的特点。

[关键词] 五全大会 延期 蒋介石

蒋介石在1932年复职后，在统治手法上有了-定的改变。笔者数年前在考察蒋介石对待胡汉民等党内反对派的态度时曾论及：

蒋已经不完全强弓硬拉般地用武，他有时甚至-会迁就党内反对派的某些主张，做出让步以换取政治上的主动。如因胡汉民与西南的不断反对，蒋便将“五全大会”的开会时间一再延期。这其实也显示了蒋介石-定程度的自信与处理党内矛盾手法的变化。^①

限于资料，笔者当时无法对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五全大会”)延期与胡汉民等人的反对之间的确切联系提供证据。现在，“蒋中正总统档案”等新资料的公开，为进一步研究此课题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将依据相关史料，概述五全大会展期的决策过程，希望借此个案的论述，窥探国民党政治文化的某些面向。

国民党的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不得已时可宣告延期，但至多不得超过一年。国民党四全大会召开于1931年底，五全大会应于1933年冬举行，但“因驻在粤桂各中委之提请”，国民党中央决定推迟。^②这也就意味着五全大会必须在1934年召开，且不能再延期。^③

1934年8月2日，国民党第四届中执会常委会(以下简称“中常会”)在南京开会决议后宣布，

将于近期公布“召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通告及重要议题”。^④当天，中执会秘书长叶楚傖向在庐山的蒋介石报告：“今日常会决定于下次常会正式决定大会日期，并于下星期二由常委会商议题。钧座对日期及议题之各种启示，乞先电示。”^⑤

一周后，中常会正式通过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告及议题案》，并通告全党。

五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随即展开，“中常会会议纪录”中有不少讨论到五全大会召集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各省市与海外党部呈报的参加会议代表名单、各地代表产生办法等，如10月4日的第141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组织委员会提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哈尔滨、热河、新疆、山西、贵州、四川等省市皆有特殊情形，其出席五全大会代

① 陈红民：《在朝与在野：1932—1936年间胡汉民与蒋介石之关系》，(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第75页。

② 《汪昨在中央纪念周报告五全大会展期原因与剿匪军事现状》，《大公报》1934年10月30日，第4版。

③ 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召开五全大会事，“以总章所限，绝对不能延期”。《王子壮日记》第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109页。

④ 《四届中执会常务会议第132次会议纪录》(1934年8月2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类：4.3，号：223。

⑤ 《叶楚傖致蒋介石电》(1934年8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

表之产生,拟用指派方法”之呈文。^①

与此同时,与五全大会召开相关的新闻也成了国内媒体的重要话题。仅从《申报》1934年10月间的新闻标题即可窥出一斑:“粤各党部开始选举五全大会代表”(10月4日)、“两路党部通电拥护五全大会”(10月6日)、“南洋荷属总支部五全大会代表抵京”(10月9日)、“粤省定期复选五全大会代表”(10月12日)、“中执会征集五全代会提案”(10月13日)、“五全代会:粤代表将参加”、“汉阳兵工厂选举五全大会代表”(10月14日)、“五全代会:滇出席代表首途”(10月17日)、“五全大会礼堂业已修竣”(10月18日)、“闽省选举五全代表”(10月19日)、“五全代会开幕期近,各院部会起办工作报告”(10月20日)、“海外代表昨午回国抵沪”(10月22日)、“湘五全代表准备提案”、“五全代会外部工作报告编竣”(10月23日)。

然而,就在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各地代表整装待发,远道的海外代表甚至已经到达南京之时,10月25日的国民党中常会却突然通过决议,宣布五全大会展期:

(一)常务委员提议:迭据各省市党部、各担负剿匪责任之中央委员陈述理由,请展期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情词恳切,应否采纳,请公决案。

决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举行,其日期由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之。

(二)定于本年十二月十日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②

向25日中常会提议会议延期的是在“剿共”前线的蒋介石。他于10月22日从洛阳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前线“剿共”军事成功在即,前方将领不能离开为由,要求延期:

据各剿匪将领之中委顾祝同篠电,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李扬敬、缪培南等号午电,刘峙巧电及张学良、钱大钧、夏斗寅、何成濬、张群等皓电,陈庆云等弩电,商震等号电,先后陈词,金称:赤匪肆虐,时将八年,毒及九省。国力民生,交受其敝,故剿赤工作,实为安内攘外,救亡图存,当前唯一之要务。往者迭次进剿,辄以临时发生枝节,功败垂成,坐令匪焰嚣张,不可收拾。追雌般鉴,良用痛心。此次进剿以来,幸赖各路同心,将士用命,我军节节胜利,……赤区日蹙,匪势日穷。盘据赣中多年之伪

都,指顾可破,渠魁授首在即。此正最后争持,短兵相接之时,一刻不容稍懈。惟查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为遵党章,拟于11月举行,凡我赣粤闽湘豫鄂皖川黔各省区之剿匪军队,应选代表数十人,非惟战地选举不易,即如期产出,而各高级将领若届时均须离防出席,深虞军心不专,影响剿务,致功亏一篑。为免蹈往事之覆辙,及策励军事之进行计,可否转陈中央,酌将五全大会展期召开,俾前方得以专心进剿,早日完成任务。国家幸甚。民族幸甚。等情。查剿匪进展,收功在途,确值浮屠合央之际,政局最贵安定,军事不宜松弛,顾祝同、陈济棠诸同志所陈各节,顾虑兹多,均属实情,殊有重加考量之余地,合为转陈,敬祈准将五全大会展期召集。所关实大,是否有当,祇候公决示遵。^③

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绝非儿戏,在会期已非常临近时突然改期,难免让人疑窦丛生,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几天后,中央常委、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解释延期原因,强调系“剿共”军事的需要,对外间“有谓以完成剿匪,为大会延期之原因,仅为表面的理由者”的说法予以驳斥。五全大会再次延期已经违反党章规定,汪对此的解释是,国民党二全大会与三全大会之间曾因北伐战事,而延期达两年之久,“援前例以济法理之穷,实未尝不可”。^④蒋介石提出的理由及汪的解释虽与当时“剿共”军事进展颇能切合,但却非常勉强:会议从通知起筹备已经近三个月,“剿共”军事一直在进行,其间并无重大突发事件,“各省市党部、各担负剿匪责任之中央委员”如果有延期要求,早就应该陆续提出,何至于要到最后关头统一行动,而中央又不惜冒“违背党章”的恶名接受建议呢?

汪精卫在中央纪念周的演讲最后,突然提到“颇闻有人讥中央为软弱,为无力量,这完全是不明大势的话,中央决不软弱,决不是没有力量。须

① 《四届中执会常务会议第141次会议纪录》(1934年10月4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类:4.3,号:224。

② 《四届中执会常务会议第144次会议纪录》(1934年10月25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类:4.3,号:224。

③ 《事略稿本》(1934年10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

④ 《汪昨在中央纪念周报告五全代会展期原因与剿匪军事现状》,《大公报》1934年10月30日,第4版。

知道武力是由人民身上一点一滴的血和汗所造成的,我们不愿意误用力量,也不愿意他人误用力量。”这显然是解释五中全会延期的原因,在此处却令人费解:他一再强调延会的原因是推进“剿共”战争,加强军事行动,这分明是“强硬”,怎么会反被人讥为“软弱”?莫非他还另有所指,五中全会延期别有隐因?

二

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国民党内有一股强大的反对由南京主导召开五中全会的力量。

1932年初,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确定在广州成立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行使职权。胡汉民等人遂利用该两机关对抗南京政府,形成了“胡汉民—蒋介石”、“西南—南京”的对立。胡汉民等人从主张分享权力到要求推翻南京政府,走向全面对抗:在组织上,组织“新国民党”,其党务扩展到华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宣传上,编辑出版《三民主义月刊》等报刊宣导其政治主张;在军事上,胡汉民及两广实力派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其目标是要策动一场全国性的反蒋运动。^①胡汉民为西南制定了“对中央行为均表反对”的基本策略^②,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与蒋介石对着干,有时甚至是蛮干,“为反对而反对”。这是典型的在野派思维。

胡汉民将其反对南京政府的斗争定性为“党权”对抗“军权”,称蒋介石是“军权”凌驾于“党权”之上。^③在胡的语境中,他才是“党权”的代表,当然要强烈反对南京主导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胡汉民1934年8月初公开表示,“在南京军权统治下所召集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个人将坚决反对,因南京现时之一切措施,皆违反孙逸仙博士之遗教,我人要在该时期内,作剧烈之反对运动,以维护党之真精神,使不为军阀所假借利用。”^④南京方面宣布五中全会会期与议题后,两广方面加大了对抗力度。9月8日,胡汉民率在两广的中央委员(包括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发出“齐电”,要求补充五中全会的四项议题,“齐电”指出:“国家民族之危亡,势如累卵”,南京国民党中央所颁布的议题,“无一及于当前救亡之大计”,“不适于今日救亡之需要”,故特别提出四项补充议题:1. 整饬政治风纪,惩戒丧权辱国之军政当局案;2. 严惩一切淆

乱社会危害党国祸首案;3. 确立外交方针并国防计划,以维护国家之生存案;4. 确定最低限度生产计划,取消破坏本国工商业及国民生计发展之媚外关税税则,并整理财政救济农村案。“齐电”强调,两广“势必坚持上述主张,奋斗不已!苟利于党国,任何牺牲,在所不辞。”^⑤四项补充议题的关键是要求“惩戒丧权辱国之军政当局”,实际是要求惩治蒋介石等人。果真依此而行,则蒋介石等唯有下台。南京方面前已应两广的要求将会议延期一年,胡汉民没有理由再阻碍会议召开,便改用提出南京方面不能接受的议题寻衅杯葛的策略。

9月25日,胡汉民等人鉴于“齐电”发出后,“中央竟置而不议,受而不答,其在各地并严禁报纸刊登”,而再次向南京发出“有电”,要求在五中全会前先实行二事:1. “履行本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之政纲,容许一般人民对于政治外交之建议及批评”;2. 厉行本党民主集权制度,予中央委员及海内外各级党部党员对于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应有充分建议讨论及批评之完全自由。“有电”再次声明,如果南京方面不能落实,则“今后引起任何党务政治上之纠纷,同人等实不能任其咎。”^⑥胡汉民也发表“为五中全会告同志”的公开信:“在南京统治下所召集的五中全会,必将为军阀所挟持操纵,决不足以代表全党的意志,……凡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不甘为军阀统治的徒众,不能不反对这样的五中全会。”^⑦

在行动上,胡汉民等人积极联络各方,邀集

① 关于对胡汉民等人活动的总体研究,详见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1208。

③ 1933年6月,胡汉民曾著《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长文,刊在《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上,恢复“党权”、反对“军权”是他晚年的重要主张。

④ 胡汉民:《为五中全会告同志》,《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4期,1934年10月,第10页。

⑤ 《胡汉民等为补充五全大会议题四项致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之齐电》,《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4期,1934年10月,第5页。

⑥ 《胡汉民等质询中央对于齐电意见致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之有电》,《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4期,1934年10月,第9页。

⑦ 胡汉民:《为五中全会告同志》,《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4期,1934年10月,第10—14页。

海内外反蒋人士到广州，筹划在两广另开“五全大会”，甚至扬言要在西南“组府”。戴笠得到的情报是，西南方面“近由西南执行部电海外各级党部出席五全大会代表，限本月廿日以前到粤，并联络各省代表赴粤开会讨论对五全大会之应对办法。如中央能采纳铣电主张及承认该代表资格，则在粤经一度会议后，即可赴京出席，否则，将在粤自选召开五全大会代表，谋对抗。”^①如果南京坚持召开五全大会，将再次出现国民党公开分裂的局面。

三

南京方面与蒋介石是如何应对此一困局的呢？

在确定召开五全大会之前，胡汉民与南京之间曾有一桩未成的交易，即南京资助胡汉民出洋。当时，胡汉民因主张难以实行，有些灰心，胡的秘书李晓生衔命与汪精卫接洽，表示胡不愿再留港粤，欲即出洋，“请中执会畀以一函，并拨助旅费十五万至廿万元，无庸给予名义”。动身前，请孔祥熙或孙科到港一谈，胡即可成行。蒋介石与汪精卫虽然狐疑，但认为“胡既有此意，故概允照办”，提出胡出国前要到京或沪一晤，对外昭示胡已经与南京“合作”。李满意而归。^②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大会选举与议案，可以胡（汉民）等为参考。”^③表明他考虑在五全大会中接受胡汉民的要求。然而，香港方面传出的消息，却说是蒋介石欲于五全大会前促胡去国，“汪（精卫）为之奔走居间，心劳日拙。”汪精卫遂在上海以答记者问形式说明出洋“乃胡自愿而中央赞成之，并非中央迫胡出洋。”此举激怒了胡汉民，他发表长篇谈话，称自己的出洋“绝非事实，系南京欲分化西南并企图借款而造此谣。”胡对汪攻击愈烈骂愈肆。^④这使得南京非常被动。汪精卫向蒋介石报告此次交易未成功的原因是胡汉民身边的人意见分歧：

胡本无出洋决心，最近因受陈济棠感触，曾发牢骚，其左右李晓生一派遂欲藉此使胡转变态度，接近中央，而刘芦隐一派则极力反对，及见李晓生接洽已有头绪，遂联合萧佛成等出而破坏。陈济棠亦派人赴港谒胡，备致挽留。胡遂决意中止出洋，反藉此题目肆口中伤。^⑤

在胡汉民等人的激烈反对声中，蒋介石先后派曾成功策反韩复榘的蒋伯诚、粤籍将领罗卓

英^⑥到广州，接洽各方，打探情况。蒋伯诚、罗卓英等抵粤后接触各界得出的结论是，以陈济棠为首的实力派与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他们对待南京当局及召开五全大会的态度不一样：

连日与此间人士晤谈及观察所得：（1）一般人对政客厌恶已极，伯南颂扬其治安同情建设，而惋惜其无与政客绝缘之勇气；（2）南路将领对港方十分痛恶，双十节燕塘飞机表示到处有“打倒和消灭安稳在租界的政客”一类之标语，对广西则谓其离隔中央太远，合作可能性较少，但广东决不令广西有若何异动也；（3）伯南有决心少勇气，其本人及其左右多稳健派，无不利中央之念，但中央希望与要求于彼者，似亦不宜太多，应逐渐为之较妥。^⑦

伯南为陈济棠字，港方、政客系指寓居在香港之胡汉民等人。基于这样的观察判断，蒋伯诚与罗卓英均建议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重点争取陈济棠。汪精卫向蒋介石转述的建议则说得更清楚：“两广武人与所谓政客心事完全不同。政客盼望中央对两广难堪，可乘机鼓动滋生事端，武人则惟盼望相安无事，故中央宜认定此点，先对武人想得办法，再敷衍政客。若先对政客张惶敷衍，转增

① 《戴笠致蒋介石电》（1934年10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

② 《蒋介石致蒋伯诚电》（1934年8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

③ 《蒋介石日记》（1934年9月7日），手稿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④ 《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4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

⑤ 《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4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胡汉民方面则由其女儿胡木兰出面断然否认，香港《中兴报》上刊出专文，指出“身为行政院长，更兼外长如汪兆铭者，也公然造谣，似乎会使人骇叹。”《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2期，第113页。

⑥ 蒋伯诚（1888—1952），字志迪，诸暨湮浦镇人。苏州武备学堂毕业后任保定军官学校教官。1926年北伐军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参谋长。1928年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总参议。受蒋介石之命分化西北军，游说韩复榘于1929年叛冯玉祥投蒋。后在策反粤军中扮演重要角色。

罗卓英（1896—1961），字尤青，别号慈威，广东省大埔县人。中学毕业后北上投考保定军校，与陈诚结为莫逆之交。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起在陈诚麾下任师参谋处长、参谋长。中原大战后，任陈诚第18军的第11师师长，后升任第18军副军长。1935年晋衔陆军中将。

⑦ 《罗卓英致蒋介石电》（1934年10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

其势。”^①蒋介石对胡汉民与陈济棠的关系及区别十分清楚，他在蒋伯诚到达广东之初即特地给陈济棠电报，笼络之意十分明显：“迭接伯诚兄来电，具审吾兄推诚相与，披沥倾谈，……谋国公忠，实深佩慰。国事如斯，唯期戮力共济，吾人相知有素，彼此不致受人离间也。伯诚在粤，一切仍希随时与之接洽。”^②

8月中下旬，蒋伯诚将与李宗仁、陈济棠晤谈内容报告给蒋介石，强调二人都不反对召开五中全会，只恐怕意见分歧，强行召集，更起纷争，“总要平安过去为上”。^③李宗仁更强调，“每次全会都是不祥，此次总要平和过去为宜”。^④证诸历史，1929年的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北伐胜利后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开除李宗仁等桂系将领与陈公博等改组派成员的党籍，导致会后不断有地方实力派同中央开战。1931年底的四中全会，更因党内分裂，竟然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三个地方召开。李宗仁“每次全会都是不祥”的提醒，对蒋介石应该有很强的警示作用——不要因强行开会而加剧冲突。蒋介石无奈地表示，“五中全会之召集纯系照章举行”，他对于会议“绝无奢望亦不必过于失望。”在日记中记下了犹豫：“对粤方针不理或展会期？”^⑤汪精卫则另有担忧，即如果再不开会，胡汉民等人可能会借此否认国民党中央的“合法性”，因为党章相关的规定甚严，“若法外延期，则彼辈又可根据总章认现任中委届时失效违法，则纠纷更多”。^⑥此时，开与不开都为难。这是当朝者的尴尬。

8月21日，事情有了重要进展。陈给蒋介石的复电中提出推迟召开的建议：

南昌委员长蒋钧鉴：洽密。必亲译。伯诚兄转来钧座元申秘牯电，询职对五全会意见，当时对伯诚兄面谈，无特别意见，且不欲有所主张，但日来卧病在榻，仔细思量，现在各方意见不一，似不如迟步召集，待取向元老解释而使到各方快意，共维国脉，更为妥适。是否可迟，并迨密示为禱。职陈济棠叩。马。印。^⑦

蒋介石立即回复陈：“五中全会召集稍迟，固无可。中（蒋自称——引者）日前亦曾去电与中央诸同志商讨及此，以格于党章，均谓无法变更。”蒋同时要求陈将“与各方解释之结果”及时电告。^⑧蒋介石郑重否认外界关于他要通过五中全会争取做“大总统”的传言：

微闻南中有谓大会召集之目的，纯为欲开国民会议，以解总统问题者，甚或有人以中为总统候补而与各方密洽谅解者，不但蕲其造谣中伤，实属招摇撞骗。中必坦白公开要求个人之信任，绝无惺惺作态之必要，现值困难日加严重，远东战事旦夕可以发生，为应付一切事变计，以不任元首为最宜，根本不作此想，自审甚明，与南中诸同志明言之，如有以总统问题来商者，即为污辱吾人格，可概严拒，不予讨论。^⑨

蒋介石同时安抚桂系，答应考虑为其拨款及为黄绍竑提供新的职位。蒋在日记中写道：“派罗（卓英）赴粤，以封匪缉私为条件”^⑩，“发桂补助费”。^⑪

胡汉民等元老派的强硬态度不改，总以破坏南京方面的计划为目标。9月30日，陈济棠向蒋介石提出：“据观察各方所得，若未有具体之解决方法，而遽开五中全会，不特意见歧分，无补时艰，恐将内部分裂治口愈纷。”希望将五中全会最少展期三个月。^⑫10月1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闻

① 《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4年8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汪精卫在另一电报中更详细地分析胡汉民、陈济棠与李宗仁的不同处境与立场：“展堂一派惟欲拆台，伯南一派惟欲自保，德邻、健生一派则以为欲求自保宜先拆台，故对于五中全会前目的即不尽相同，手段却必然一致，南京之台拆得愈糟，则其自保愈固。”《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4年10月1日）。

② 《蒋伯诚致蒋介石电》（1934年7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

③ 《蒋伯诚致蒋介石电》（1934年8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

④ 《蒋伯诚致蒋介石电》（1934年8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

⑤ 《蒋介石日记》（1934年9月16日），手稿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⑥ 《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4年8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

⑦ 《陈济棠致蒋介石电》（1934年8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

⑧ 5陈济棠致蒋介石电6（1934年8月21日），（台北）/国史馆0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之/特交档案0。

⑨ 5蒋伯诚致蒋介石电6（1934年9月1日），（台北）/国史馆0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之/特交档案0。

⑩ 5蒋介石日记6（1934年10月3日），手稿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⑪ 5蒋介石日记6（1934年10月2日），手稿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⑫ 5陈济棠致蒋介石电6（1934年9月30日），（台北）/国史馆0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之/特交档案0。

粤方已聚海外代表百余人,预备在粤开五全大会,粤方明知无各省代表决不能开成,每欲以此为开对等会议之交换条件。日本新闻对此事十分张惶鼓吹,用意显然。三十电所述—退让。—坚持。必择其一,似已到最后决定之时,现非虚与委蛇所能有效。要求蒋在/坚持0与/退让0之间速做决定。¹

情况紧急,蒋介石权衡利弊,决定/退让0。10月6日,蒋记道:考虑/缓开会议步骤0,对于五全会决延期0。⁰所幸,陈济棠为维持两广/半独立0现状,不愿看到双方撕开脸面,故竭力牵制胡汉民等人的行动。蒋伯诚、罗卓英抓住这一点,拼命游说拉拢。10月12日,罗卓英与陈济棠密商形势,陈表示不会允许在广东另开五全大会,南京方面也要考虑会议延期,但他/因处境困难,不便单独主张直接建议0。罗卓英因此向蒋介石提议:

职意五全会可就中委中之剿匪将领以剿匪将成为理由,联名建议展期,则责任共负,事实可通。”

在南京与蒋介石的立场上,这是一箭双雕的方案:接受陈济棠的建议,瓦解西南阵营;军事将领用/剿共0军事为借口,也可避免向胡汉民等人/屈服0的社会观感。故蒋立即回复罗,从善如流:/五全大会既咸认为有展期之必要,伯南兄如不便单独主张直接建议,似可约粤桂现任军政之中委致中一电,中当约集此间中委之剿匪将领陪同建议于中央,则责任自可共负,各方亦均能兼顾矣。尚希与伯南兄妥商进行为盼。^{1/4}

此后的发展即循此目标前进。12日当天,蒋介石从西安致电叶楚伦,正式提出了五全大会延期的建议:

弟今抵长安,观察南北各方情势,大会似须展期,否则内部纠纷,匪势坐大,将士分心,将有功亏一篑之虞。昨派罗卓英赴粤协商进剿事,闻粤中多以大会展期为前提,而一般将领期求更切。弟意大会之期尚有一月时间,如粤中有电展期,则不如允其意,否则中央自动的,或以各省市党部与当选代表名义请求展期,一俟赤匪剿清,再开大会,先求内部妥协,以免纠纷,且赤匪未清,外侮频乘,本届委员职责未了,亦应负责自效不能以开会自解。况中逾期展会,向有成例,非自今始。请以此意先商汪、孙二同志,如得同意,再提公议,但不必以此原电提案为妥。^{1/2}

电报中除提到由军事将领发电报要求延期

外,又提出要以各省市党部与当选代表的名义提请延期,营造多方共同/请求0的声势。次日,蒋致电陈立夫,布置各省党部的工作:/先密令各省市党部当选代表勿即入京,一致请示展期。^{0 3/4}

在军事将领方面,罗卓英与陈济棠密商由顾祝同发起,让各/剿共0前线将领分别致电蒋介石,主张五全大会延期,再由蒋把将领的请求汇合/报中央0,则责任共负,又可避反动者军人于党之借口。⁶蒋遂电令顾祝同办理。在地方党部方面,陈立夫等也加紧以电报阻止国内各地代表启程,/海外各地则必须去电,惟已有一部分起程者,恐不及接电。⁰陈考虑到由当选代表/建议缓开0,恐有流弊0,故只以党部名义/建议为妥。^A陈立夫、叶楚伦等人/密示各省市党部向中央建议于一星期内电达中央展期0。^A在他们操纵之下,先后有浙江、湖北、江西、山东、甘肃、福建等14省党部,上海、南京、天津等市党部,北宁、正太等特别党部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要求五全大会延期召开,理由相同:/若如期举行五全会,恐负军事重责之同志回京后致授赤匪以死灰复燃之机,应俟剿匪军事结束再行召集。^{0 1/2}

在南京的中常委汪精卫、孙科、居正、陈立夫、陈果夫、叶楚伦等经过协商,完全接受了蒋的意见,同意五全大会延期,他们反过来催促蒋介石:/此项建议拟于下星四提出常会,因本星四来不及也。惟下星四已是二十五日,为期已迫,势难再

¹ 汪精卫致蒋介石电6(1934年8月26日),(台北)/国史馆0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之/特交档案0。

⁰ 5蒋介石日记6(1934年10月6日),手稿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 5罗卓英致蒋介石电6(1934年10月12日),(台北)/国史馆0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之/特交档案0。

^{1/4} 5罗卓英致蒋介石电6(1934年10月12日),(台北)/国史馆0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之/特交档案0。

^{1/2} 5蒋介石致叶楚伦文戊机陕手稿6(1934年10月12日),(台北)/国史馆0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之/特交档案0。

^{3/4} 5蒋介石致陈立夫文元机陕手稿6(1934年10月13日),(台北)/国史馆0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之/特交档案0。

⁶ 5罗卓英致蒋介石电6(1934年10月15日),(台北)/国史馆0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之/特交档案0。

^A 5陈立夫致蒋介石电6(1934年10月18日),(台北)/国史馆0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之/特交档案0。

^A 此电稿10月17日由叶楚伦命王子壮草拟,经汪精卫/稍改后即发出0。5王子壮日记6第二册,第148页。

^{1/2} 5中常会议决五全大会展期6,5申报61934年10月26日,第3版。

延。望再电罗军长务催伯南等即依吾兄寒酉电所示,迅速进行,至迟于二十三、四日有电到京为妥。⁰¹

如此,就有了10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迭据各省市党部、各担负剿匪责任之中央委员陈述理由,请展期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⁰,而顺应其请,延期召开五全大会的一幕。

南京方面宣布展期后,胡汉民等人在两广另开五全大会的活动并未停止。蒋介石派出与胡关系密切的王宠惠、孙科南下,与胡协商沟通,矛盾终于缓解。

四

由此可知,1934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延期的真实原因是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蒋介石基于胡汉民等人的坚决反对,不愿由开会导致党的公开分裂而不得已采取的策略,是一种妥协。汪精卫那段/颇闻有人讥中央为软弱,为无力量,这完全是不明大势的话,中央决不软弱,决不是没有力量。,,我们不愿意误用力量,也不愿意他人误用力量⁰的议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的。

拨开迷雾见青天。国民党中央常会宣布延期召开五全大会的理由,竟然是似是而非的/幌子⁰»,在这个幌子背后,是一连串的冲突、密商、折冲、交易和操纵,真让人怀疑在诡秘的国民党政治文化中,还有多少真相需要去探求。此一个案,透露出1930年代国民党政治文化的几个特征:

11 国民党内矛盾冲突不断,有的会激化,诉诸武力以至分裂,但有的也能通过各方的折冲与沟通加以化解。对立各方能找到合适的方式与人物进行沟通,达成较好的效果。五全大会延期召开是一个较成功的例子。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以胡汉民出国/养病⁰为契机,1935年底召开五全大会时国民党内实现了基本的团结,制定了新的内外政策。而胡汉民出国,原本就是1934年试图运用的方法。过往的研究中,对1930年代国民党内以协调化解矛盾的能力注意不够。

21 蒋介石在对待党内反对派,尤其是对待胡汉民这样在党内有重要影响的反对派时,表现出较大的忍耐与克制,并不强弓硬拉。这显示他在掌握较充足的权力与资源后,处理党内矛盾有了一定的自信、容忍度与策略。在为五全大会延期而与西南的沟通中,他抓住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与胡汉民等元老派的矛盾,瓦解分化,最后采纳罗

卓英的建议,/掩饰⁰向西南妥协的真相。

31 此次协调虽然成功,其过程却显示出国民党缺乏现代民主意识。现代民主的基本要义是:程序优先、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在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破坏程序,既然党章已经规定会议召开的年限,国民党中常会也通过了决议,但各方却找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再援以前不及时开会的例子来/济法理之穷⁰,将党章规定轻易否定。如此,则党章的尊严何在?中常会也不惜废弃自己做的决议,妥协的成功,是以各方共同破坏制度为代价的,少数人可任意凌驾于规章及组织之上。由于缺乏反映意见与权力分享的正常途径,在野的胡汉民等人也不服从多数,置中央的决议于不顾,为反对而反对,为杯葛而杯葛,以求一逞。长期形成的政治生态与文化,使得国民党领导人,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的,都主要是依靠策略、权术与人脉关系,形成特定的/潜规则⁰:先由少数人秘密协商,做出决定,再通过组织发动形成/民意要求⁰,中央通过/组织程序⁰来完成。基本上不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循民主的途径来解决党内争端。

本文初稿2007年12月在台湾东海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发表,承陈鹏仁教授评论,王奇生教授提供意见。谨致谢忱。发表时做了较大修改。

[陈红民: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张玲: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郭昌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邮编:310028]

[责任编辑:戚如高]

⁵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4年10月17日),(台北)/国史馆⁰藏/蒋中正总统档案⁰之/特交档案⁰。

王宠惠等南下与胡汉民沟通的过程也颇复杂,有较多的史料,可构成另一篇文章。

王子壮1934年10月19日的日记:五全大会/此次又拟展期之真因,,殆仍在广东,彼方固不赞成五全大会,以格于总章,于是枝节横生,发电表示主张于大会中提出惩办为害党国之祸首,其意所指,盖属汪、蒋,并发指摘之电甚多,且胡先生在所办之5三民主义月刊6中声称南京政府卖国,反对此政府讲统一云云。似此剑拔弩张,果如期开会,不惟统一前途发生障碍,故宁愿违反总章而稍延开会,庶可相安而已⁰。王子壮日记6第二册,第149页。